

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的审思及引导路径

■ 张雪梅 吴炜生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青年的交往往往映射出其在时代变迁中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风貌。作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先锋力量,新时代青年主动且自信的良好交往不仅关涉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更可为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人类文明的交流汇聚青春力量。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我国青年的交往图景经历了从现实交往到虚实共生交往的转向,展现出青年交往观念的革新、交往身份的转变和交往场域的延展。这三重嬗变既体现了数字时代的青年通过维护边界、增强体验、拓展圈层以重新嵌入社会关系的积极尝试,同时也存在着部分青年交往浅层化、风险化、悬浮化、功利化、封闭化、失语化的风险。对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的价值意蕴与现实隐忧进行审思,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功能,在个人层面强化青年的交往本领,提高青年“敢交往”的主体意识;在社会层面凝聚青年的交往共识,夯实青年“愿交往”的现实基础;在国家层面拓宽青年的交往视野,熔铸青年“会交往”的历史主动,从而合力引导新时代青年形塑正确的交往观,使其在提升自身交往价值的基础上,为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国胸怀天下故事的传播而团结奋斗,是思想与教育工作者面对青年工作这一战略性工作所应有的理论自觉与行为主动。

【关键词】数字时代 青年交往 新样态 引导

社会交往是人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存在基本方式^[1]。作为时代风向标的引领者和建设者,青年一代在社会交往中所彰显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风貌往往能反映一个民族

收稿日期:2024-11-05

作者简介:张雪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吴炜生,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汕头大学数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阶研究”(课题编号:24CKS115)、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4年青年理论学术带头人“揭榜挂帅”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课题编号:GD24SXZY06)、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坚持党对青年的文化领导权的新时代意蕴与实践要求研究”(课题编号:STF24035T)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文明素养和发展潜力。新时代青年主动且自信的良性交往不仅关涉个体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更可为中国形象的传播和人类文明的交流汇聚青春力量。在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青年要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2]。《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也明确要求青年要“更加主动、自信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3]。但随着“搭子社交”“零糖社交”“碎片社交”“浅社交”^①等青年社交热词的“现象级”传播,如何与时俱进地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要求我们必须对数字时代中国青年的交往予以问题透视和矛盾解决,以助力青年树立正确的社会交往观,在交往中成就实践智慧的“最高德性”^[4],同时推动国家社会的最优发展。这一问题也成为近年来青年思想与教育领域的学者持续关注的新议题。

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对虚拟现实中青年社会交往的人学向度进行思考^[5];有学者从历史逻辑着手,对当代青年网络社交的流变脉络及其特点展开分析^[6];有学者聚焦现实问题,对当代青年群体社交新模式的生成逻辑、风险研判和应对策略等问题予以探究^[7];有学者则结合案例分析,对中国式关系视角下青年群体的符号社交行为开展考察^[8];还有的学者关注青年学生的心理问题,探讨网络人际交往对青年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9]。这些研究对网络社交、虚拟交往、符号社交等青年交往新样态进行理论和实践探讨,但这些交往新样态的表征、归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有效应对等问题,还需要综合个人、社会与国家等因素予以分析,才能更清晰地予以厘清和研判。因为数字交往的本质仍然是作为“现实的人”的普遍交往,是主客体之间复杂实践活动的反映,既关涉个体间资源的交互和情感的联结,也与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和民族国家间文明的往来密切相关。从普遍性来看,青年主体性的彰显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作为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闯劲、思想最活跃的群体,青年群体又蕴含着在普遍交往中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因此,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下方能对青年群体的交往属性展开规律性分析。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跟踪研究当下数字时代中国青年交往样态的新转向、新问题、新建设。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有的理论自觉与责任担当。

一、观念·身份·场域:数字时代三重嬗变向度下的青年交往新样态

当前,更新迭代极为迅速的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介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状态、思维习惯与传播结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限制被打破,呈现出虚实重叠的多重交往新样态,尤其是最适应“数字化生存”的“互联网土著”^②——当代中国青年——的信息互通方式和日常交往行为更是深深刻上“数字化”的时代印记,并在观念、身份和场域这三重向度上呈现出相应的嬗变特征,不仅生动反映了青年在个体层面的现实诉求,同时也映射出其在社会建构和价值追寻中

① 这些网络热词反映出当前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新型社交方式——“轻量化社交”。“搭子社交”是指因某一共同兴趣爱好或共同需求而结合成的社交关系,主打的是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零糖社交”指代彼此间不过分亲密甜腻的社交关系,主打一种边界感;“碎片社交”强调交往行为的无计划性,允许交往活动的不完美,主打的是灵活随机的交往。这些新型社交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其共性都是追求有边界、更轻量的“浅社交”模式。

② “互联网土著”,又称为“数字原住民”,是指在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的矛盾张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能力引领时尚、引领风气,这样才能真正做好青年工作,把青年最广泛地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当中^[10]。因此,对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景观的多重嬗变进行整体性考察,是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新特点和新规律,继而推进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

(一)观念革新:在“熟人社会”到“轻熟社会”的转向中强调边界感

作为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交互的创造性活动,人与人在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身体距离与情感区隔的问题,这实际上都指涉到交往的边界问题。与传统“熟人社会”边界模糊的黏稠社交不同,步入数字社会的青年愈发重视交往中的“边界感”,渴求以一种“追求独立又不拒绝亲密”的理想交往图景来维护自己在转型社会中复杂的内心秩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重新嵌入,转向“轻熟社会”的“浅缘社交”^①。

在缺乏流动性的传统乡土社会中,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聚族共居,亲密互助,工具性和情感性的双重黏稠化生成了交往边界模糊的生活共同体,这为青年个体获得价值确证设定了归属关系,也为他们抵御各类风险提供了稳固支撑,但同时也带来“关系社会”中规则意识淡薄的失范危机^[11]。随着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加速流动和社会分化竞争的结构性变化,大量青年劳动力为追求市场化浪潮而背井离乡。空间距离的扩大、生活体验的差异和社会风险的频发导致原本稳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逐渐式微,与“熟人社会”脱嵌的青年不得不以个体为本位来尝试独立面对“陌生人社会”中萌生的诸多不确定性问题。同时,数字技术对掌上多元化“生活服务类app”的助力“效度”,又使得当代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都能在网络平台中得到一键式满足,不必再依赖传统社会关系的支持“温度”,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部分青年与集体的疏离。随着部分青年开始选择开启“单数生活”模式,个体化趋势中青年交往的价值取向成为一个亟待我们跟进的议题。

随着数字社交平台的迭代更新和算法推荐的匹配升级,身处加速运转的风险社会中的青年得以寻求彼此保有边界但又可相互取暖的“搭子”来实现垂直领域的精准陪伴,从而也在建构着一个具备“轻熟关系”的“浅缘社会”。这一“轻熟社会”介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呈现出范围小、适配准、界限明、程度浅的“有所知也有所不知”的交往新关系^[12]。据人民智库面向青年群体开展的调查显示:54.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搭子”,37.6%的受访者表示虽然自己目前还没有“搭子”,但有需要的时候会找“搭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中,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强关系”已逐渐弱化,但却有49.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并不会与“搭子”发展成长期的朋友关系^[13],这也印证了“浅缘社交”在青年中的流行趋势。

(二)身份转变:在“身体缺场”和“符号出场”情境下隐匿性凸显

个人身份的自我塑造与彼此识别是通往人类社会交往之路的关键环节,交往身份的持守抑或转变往往受交往观念的影响。有别于传统交往中身体媒介的在场叙事,数字时代的青年在交往中多依赖于符号化的展示打造个人形象,在填补身体缺场的符号互动中,数字青年个人身份的隐匿性也在社会关系里不断得以凸显。

^①“浅缘社交”指的是区别于“深度社交”的一种关系纯粹化、互动轻便化、体验舒适化的社交新样态。

人与人之间经由身体媒介才得以完成原初的交流,随着口语传播的出现,人际交往的内容及其意义的传递又得以进一步延续,但这其中依然少不了身体的在场支持。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眼神交流等交往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人际传播中的亲密度。进入书写时代和印刷时代之后,文字符号的问世与发展使得人际交往中的身体在场感逐步被削弱,以至于在中国接入互联网世界之后,身体媒介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织中逐步让位。在“天涯社区”等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内容社区风行的年代,青年们以匿名“ID”集结于不同的网络论坛当中,围绕帖子的发布和评论,通过文字互动建构出一个个虚拟社区中的联通场景。之后,身体媒介的信息传播意义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多元社交平台的广泛使用而遭遇巨大冲击,虚拟空间中的符号交往成为当前青年交往样态的新表征。有关调查表明,虽然有30.1%的青年表示在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上花费的时间差不多,但当前仍有近半数的青年更倾向于线上社交^[14]。在开展线上社交的过程中,青年可以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通过个人头像的视觉表意、社交昵称的文字暗示、朋友圈背景的鲜明标识、个人动态的即时记录、直播互动的弹幕数据等数字化符号来塑造个人的交往身份,从而为融入相应的社交圈层提前打造好专属的“数字形象”,也尽力弥补着人际交往中因身体缺场所带来的情感裂痕^[1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泛社交时代下工作交接与生活联系的边界愈发模糊,符号展演与关系维护的负荷也日益超载,由此带来了“社交倦怠”的困境,这时候凸显个人身份的隐匿来恪守交往的边界安全感就成为数字时代下青年首选的应对之策。有的青年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为自己换上“粉色恐龙”头像,设置“momo”昵称以追求更自由的匿名社交;有的青年通过开通社交软件的小号、掩盖浏览痕迹和关注列表、设置微信“仅聊天”权限、进行通讯录分组、限定朋友圈“最近三天可见”的范围等来推行个人社交身份的隐匿化模式。这说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希望通过“数字隐身”的手段,避免现实社会身份的束缚和现实社会关系的羁绊,从而能在虚拟空间中更自主地发表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宣扬自己的情感诉求^[16]。

(三)场域延展:在“个体化生存”和“圈层化融入”的空间里重构关系网

人类社会普遍交往中蕴含的观念碰撞和身份共鸣都需要在特定的场域中方可实现,交往场域的收缩和拓展也与人们彼此之间关系网的交织密度直接相关。对于在个体化浪潮中成长起来并受数字交往生态覆盖的当代青年来说,其个体合理需要在不断得以满足的同时,个体意识也日趋强化。在传统关系结构松动和数字化技术赋能的双重影响下,当代青年在虚实共生的交往空间中更倾向于以自我为单位来实现对社会系统的重新嵌入,力求通过“圈层化融入”自主铺展全新的交往关系网。

通过共同体的结盟互助而求得自身发展并延续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诉求。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个体深嵌于亲族网络和单位体制当中,并深受其人情网络的支撑与制度网络的规约。在这一阶段,个人的交往在地缘和亲缘等差序格局明显的“强关系”中展开,社交因赋予个体自我实现的本体意义和公共评价的社会意义而带有厚重感^[17]。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在日益丰富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日益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有可能进一步从传统关系的全线帮扶中脱嵌,并逐步彰显出个体化的取向,这种现象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开放性更强的流动性空间当中,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共同体成为青年日常交

往的选择项而非必选项。随着数字互联世界的发展,数字技术又为当代青年的便捷交往与松弛互动提供了可能,但同时青年个体间发展的内卷化趋势也随着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和实时跟进的绩效算法的引入而进一步加剧,这使得青年日趋强调交往的边界感和互动的隐私性。数字时代的青年有必要且有可能探寻一种“弱关系”社交。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网络圈群存在着“关系导向型”和“兴趣导向型”两类社交活动,青年们基于人脉维系和趣缘追求的考量,在网络空间中自主匹配并聚合到价值观念相近、兴趣爱好趋同的群体圈层,形成“圈层化社交”现象。据有关调研显示,当代青年与亲戚和同事等以往的亲缘和业缘“强关系”的联结正在逐渐下降,转而更偏向于通过圈层化的融入获取网友、群友、专业人士等“弱关系”的经验分享与情感认同。一旦条件允许,线上的圈层社交还有可能延伸到线下,组织出城市徒步、飞盘竞技、桌游、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现实活动。66%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参与过网络社群组织的线下活动,也有30.8%的青年表示希望与网友在线下见面^[18]。这展现了在个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现实环境中,青年借助数字化工具积极拓展交往场域、重建交往关系的行动轨迹。

总的来看,随着社会关系的转型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青年的交往图景经历了从现实交往到虚实共生交往的转向,并展现出交往观念的革新、交往身份的转变和交往场域的延展。在虚实共生的空间中活动的青年强调交往身份的隐匿性,更倾向于通过有边界感的精准化融入,实现对传统黏稠关系的脱嵌和对新型圈层关系的重构。这不单指涉数字青年个体交往观念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青年在数字交往中社会身份的标识,还进一步向我们提出了新场域下的青年交往对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影响问题。

二、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的辩证剖析

数字时代青年的交往新样态作为青年文化构镜中的价值逻辑与行动表达,不仅表征着青年在现实交往中的心理诉求,而且反映出青年在国家和社会大势中的交往样貌与力量趋向。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有必要贯通“个人—社会—国家”的逻辑主线,客观分析青年交往观念、身份和场域发生新转向的价值意蕴,并对这些新转向可能存在的现实风险进行研判,这是强国复兴新征程凝聚青年力量、立稳价值导向的关键。

(一)青年搭子社交在维护边界的同时面临交往浅层化和风险化的问题

“搭子社交”是数字时代青年维护交往边界的典型社交方案。作为“非黏稠化”社交,它强调精准陪伴的分寸感,青年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诉求,通过多元且便捷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自主匹配特定场景中的陪伴者,既能在高效率的社交活动中感受到联结轻盈关系的情感欢愉,又能始终占有延续或终止趣缘关系的主动权。高质量的“搭子社交”不但可以让青年找回“消失的附近”,通过与志同道合者在虚实空间的交互中获取同频共振的情绪价值,还能通过相互鼓励与督促实现彼此的目标。以近些年来青年群体中颇受欢迎的“City walk”“飞盘社交”“志愿联谊”“学术酒吧”等新型社交活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正通过主动创造线下社交的新赛道来强化自我赋能,尝试建立更有质感的社会关系。据DT财经和DT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搭子调研”报告显示,近85%的人认为搭子型社交的优势在于“互助”。这说明在节奏

不断加快的原子化生活中,当代青年并非不需要交往,而是在尝试寻求更实用的新方式来代偿传统社会关系的式微^[19]。

可以说,“追求独立又不拒绝亲密”是当前青年理想的交往图景。人民智库的调查也显示,青年群体在选择交往对象时除了要求对方需品行端正并和自己有共同爱好之外,有37.9%的受访者也表示自己会观察交往对象是否“有边界感、不越界”^[20]。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搭子社交”所强调的“边界感”该如何妥善把握?如何避免因过度强调交往边界而阻隔深度交往通路的问题?在受算法裹挟的社交平台中,是否会出现虽然设置边界要求但却遗憾落入社交陷阱的悖论?青年人的成熟度是否足以正确把握“搭子社交”所强调的“边界感”?实际上,“搭子社交”在让部分青年享受到交往关系纯粹化、互动轻量化、体验舒适化特质的同时,也会出现渐渐丧失深度交往意识与能力等问题。

同时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数据来源多、匹配成本低的“搭子社交”平台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人员构成复杂和信息识别难度高等问题,极易出现伦理失范甚至违法犯罪等社交隐患。近年来,媒体中关于运动搭子、旅游搭子、游戏搭子以“交友”之名行“诈骗”的报道并不少见。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当交友软件或婚恋网站上结识的异性找自己借钱或投资理财时,仅33.7%的单身青年会明确拒绝,66.3%的单身青年表示可能会答应^[21]。这都提醒我们,借助数字化工具开启从浅层关系到亲密关系的探寻之旅,在真正发挥交往边界保护功能的同时又能保证自身与外界正常交流的通透性,依然是青年群体在交往中需要持续思考的难题。

(二)青年虚拟社交在增强体验的同时存在交往悬浮化和功利化隐忧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纵深推进,以数据海量、算法升级以及算力加速为核心表征的人工智能对社会各领域实现深度嵌入与整合,智能化时代中数智媒介实现了对大众社会交往场景的全息重塑,数字技术所搭建的立体化媒介场景实现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的全方位联动及其沉浸式体验,这使得活跃于数字空间的青年用户能在虚拟社交中感受到身临其境的瞬时互动体验。另外,通过短小精悍的文字图像、调动情绪的背景音乐和极具冲击力的视频画面等多模态媒介的融合,数字空间场域能有效彰显虚实互动的机理,摒除传统交往中纯粹文本与语词叙事的平面化和枯燥性,满足了信息碎片化时代中的青年在交往中感性体验和直观理解的诉求。

但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由数字技术搭建的精准模塑和全景敞视的数字空间里,视觉呈现的图像化、内容设置的碎片化和价值表达的标签化,促使人们以往经由面对面深度互动后达成的理性认同,逐步让位于直观感性的情感诱导和心理共意。部分青年在刷“抖音”“小红书”“快手”等社交平台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泛社交所带来的感性化瞬时体验让部分青年沉溺于虚拟空间中的数字身份,忽视现实空间中的沟通交流与深入思考,不仅容易产生“线上狂欢,线下孤独”和“线上社牛,线下社恐”的社会交往困境,还会造成部分青年理性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的钝化,不利于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熔铸。诚然,社交平台的信息交流和传播虽然能够提升青年互动的效率,但部分青年在数字空间中由于脱离现实世界的必要规训,也容易在快感刺激、情绪交互和盲目随从的非理性化场景中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予以偏执独断的非理性

宣泄,甚至引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还可能将网络中的“舆论极化”衍生到线下,催生出现实暴力,破坏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过度依赖“身体缺场”的媒介交往看似可以一键链接万千关系,但线上的虚拟互动毕竟不能取代真实的线下交汇,长此以往难免带来交往的悬浮化,也即虚拟空间中社会关系的数量与质量无法真正实现匹配,由此就会带来浮于表面的交往“强链接”假象。

另外,当前大数据算法已无缝深嵌进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内容分发和媒介运行的全过程,成为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这就导致各种遵循利益至上的资本势力必然会竞相争夺数字空间中思想和行动均活跃的青年群体。在资本扩张与技术赋能的助推下,带有资本烙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正在各种数字社交平台和虚拟仿真技术等形塑的泛娱乐数字生态中加速生产与传播。应该说,囿于功利导向和量化考核的影响,部分青年确实需要借助娱乐产品来缓解和消除因现实压力和负面情绪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而智能化场域中构建的一系列“视觉景观”恰恰契合这部分青年群体的心理诉求。但是,我们要慎防社交平台中宣扬的价值评判标准从“向上向善”的集体主义追求转向“个人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误区。这是因为极端个人主义者深谙部分数字青年在现实世界中身份矮化和发展受限的境况,常常借“商品拜物教”与“数字拜物教”的联姻之势,以数据监测、算法推荐、流量直播、虚拟偶像等创设“数字化全景监狱”对其加以宰制,误导其逃离现实,只顾取悦自我。当这部分青年沉溺于数字消费主义、符号消费主义之中,就极易遭遇数字伤害,在交往中秉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一味算计交往成本,漠视自我以外的公共生活。一旦陷入“逐利自享、以利相交”的“交往功利化”的泥沼,势必会逐渐丧失主体成长的真实感,并导致对集体事务的疏离^[22]。

(三)青年圈层社交在拓展关系的同时隐含交往封闭化和失语化危机

作为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的突出表征,青年的网络圈层社交反映了青年在互联网空间中强调个体化标识与圈群化认证的交往新尝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组织开展的统计调查表明,2024年上半年我国网络资源供给持续丰富,数字消费市场培育壮大,互联网在汇聚11亿网民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交选择和行为习惯,这种影响在青年群体当中的表现更是明显。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近11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其中,青少年占新增网民的49.0%,20岁至29岁、30岁至3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5%、19.3%,占比总数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23]。高度网络化的社交环境促使部分青年因合拍的性格特质、投契的兴趣爱好、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聚合为多个超越组织限制和关系束缚的网络圈层,如“饭圈”“二次元圈”“模玩手办圈”等。这为当下青年建构个性化社交网络,拓展交往场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互联网圈层化社交的兴起不仅推动了青年交往场域的虚实共生的态势,同时也对当前青年的政治参与带来显著的影响。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圈群参与度高、群体黏合性强的“丰富型”网络社交圈群在意见表达与政策协商方面往往积极性更高^[24]。

然而,青年圈层社交在拓展关系的同时也隐含着交往封闭化和失语化的危机。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产业结构和形态的转换,使得社会公众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成为可

能。而当代青年正身处向未来的数字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Z世代青年的个性态度、生活习惯、消费方式乃至职业选择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特质。绝大多数的青年每天都能在互联网上“收音”和“发声”,这有利于形成多向互动的网络空间生态格局,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正加速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诸多挑战的国内局势叠加,中国处在矛盾凸显期、风险聚集期。经济转轨、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使得利益格局经历深刻调整,青年的思想观念也日益多样。青年一旦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调适无力,就很容易产生思想错位和行为失范的后果。圈层化传播中不可避免地会弥散“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和“沉默的螺旋”等封闭化效应,这使特定圈层中部分青年的利益诉求、立场观念、思维风格和行为模式等都极易受到圈内人的煽动。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当前为“平台资本主义”^①辩护的算法控制者非常善于通过“算法黑箱”^②,蓄意将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消费主义等带有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内容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中,或者借由“深度伪造”技术和“社交机器人”^③等开展意识形态操纵,其往往会选取特定的时间节点,对相应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刻意扭曲和泛政治化改造,并兜售数字自由、数字民主、数字人权等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导致青年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失序和价值失范问题,更会消解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凝聚和引领功能,引发主流意识形态离散化危机。

另一方面,部分青年在圈层社交中的符号狂欢与叙事落寞的矛盾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部分青年可以在社交平台上用自由拼接的网络热词、随意套用的传播热梗、戏谑恶搞的表情包等符号来表达自我的观点与情绪,然而当这些杂糅的狂欢符号退场之后,我们却发现社交平台上实则只留下“文字失语者”们张口难言的窘况和词不达意的落寞。2024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共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半数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从表面上看,阅读量少和依赖网络语言及表情包是这些青年“词穷”的主要原因。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沉迷在虚拟社交中的部分青年在面对现实互动时的主动退却所导致的精神贫乏才是语言贫乏的根源^[25]。因而在豆瓣上就有一个名为“失语者互助联盟”的小组已聚集了38万人之多,组员们坚持每日“咬文嚼字打卡”,互相督促对方多多阅读写作,以求摆脱“文字失语症”的困扰^[26]。语言不仅是人类交往的载体,更是民族文化相通的基础和国家文明交流的桥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化形态和文明价值,必须建构起强大的话语逻辑和一整套兼具民

①“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沿袭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本质。参见杜巧玲 肖 峰:《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②“算法黑箱”是指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媒体机构、技术公司的排他性商业政策,算法犹如一个未知的“黑箱”——用户并不清楚算法的目标和意图,也无从获悉算法设计者、实际控制者以及机器生成内容的责任归属等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评判和监督。

③“深度伪造技术”是指“生成式对抗网络”的机器学习模型将图片或视频合并叠加到源图片或视频上,借助神经网络技术进行大样本学习,将个人的声音、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拼接合成虚假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社交机器人”是“计算宣传”进行价值渗透的重要工具,其本质是一种智能算法,能够模仿人类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发布、评论、转发与关注等行为。参见余 杰:《智能算法下网络价值观引导的危与机》,载《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2期。

族性和现代性的话语范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传播者,只有提高以基本叙事话语转换为核心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因而,青年文字失语的问题不仅会弱化青年个体表达背后的思维深度,也会削弱国家文化的凝聚力,还会大大减弱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效能^[27]。

三、应对数字时代青年交往矛盾问题的引导路径

“保持独立又不抗拒亲密的分寸感如何把握?”“在虚实共生的空间中怎样彰显现实主体的理性地位?”“怎么破除圈层禁锢的魔咒以凝聚持续交往的力量?”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存在的“有边界的嵌入”与“虽入圈却难聚”之间的现实张力,实质是青年在交往中无法妥善处理“生理成熟与社会成熟、个体慎独与社会融入、现实诉求与理想追求”这几对矛盾关系,导致出现浅层化、风险化、悬浮化、功利化、封闭化、失语化等交往风险,这既有个人自我认识偏差的原因,也反映了部分青年在面对“个人交往本领、社会交往生态和国家交往要求”等问题时存在的思想迷思与行动失衡,需要我们在审思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新样态的价值意蕴与现实隐忧的基础上,找到有效应对路径。

(一)个体层面:强化青年交往的本领,提高青年“敢交往”的主体意识

一是提升青年主动交往的价值自觉。部分青年对个性化趋势下交往价值的模糊认知是导致其不敢投入深度社交的重要原因。青年应在“真实的集体”交往中把握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筑牢将自己的人生志向与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底盘,增强将个人“小我”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我”之中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此,青年应强化理论武装,明晰积极的“个性化交往”与消极的“个性化交往”之间的区别。现代社会中积极的“个性化”绝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决然对立,也不是个体与集体的绝对割裂。主张人在交往中的“个体性”与“集体性”非此即彼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个性化交往”。新时代中国语境中一直强调的“集体主义”,是致力于社会成员在“个体意识”与“集体属性”和谐互动中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这里的“个体意识”并不是主张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绝对割裂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强调个体在普遍交往中彰显自身社会属性的“现实的个人”的意识。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在日常交往中应摒弃个体与社会绝对化对立的思维困局,超越个体狭隘的功利意图,投入个人与集体共生相长的交往共同体中共建美好生活。

二是增强青年主动交往的过硬本领。过度依赖浅层交往或轻易陷入社交陷阱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部分青年欠缺交往能力直接相关。对此,一方面,青年要深刻认识到人的一生总是要在广泛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加强磨炼,增长本领。处于人生黄金时期的青年要自觉加强学习,这要求青年既要在经典文本中读有字之书,也要在社会交往中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在实践中求真知,悟真谛。当前,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已广泛渗入青年日常交往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青年一方面要加强数字素养,不仅要在数字社会的背景下重新省思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发展去向,寻求更广阔的社交天地,在主动求变中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还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为自己展开更具灵活性和广阔性的交往行动赋能。另一方面,青年也要注

意防范网络社交中的社交风险,通过研究网络空间和学习数字化技术,努力提升抵御数字伤害的本领^[28]。事实上,随着《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和《加快数字人才培养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等政策措施的先后出台,我国网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整体水平持续提升,当前有近六成网民达到数字素养与技能初级水平,在20-29岁的青年网民群体中,能够熟练“使用编程语言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已占9.4%^[29]。未来,青年还要继续提高自身的数字化认知理解、应用操作、思维观念等能力,力争成为网络强国建设的新一代主力军,以数字信息化赋能交往的高质量发展。

(二)社会层面:凝聚青年交往的共识,夯实青年“愿交往”的现实基础

一是坚持“交往共建”理念,形塑多元主体协同促进青年有序交往的合力。一方面,共青团、青联、学联组织等要继续在促进青年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加强对各行各业青年的凝聚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青年参与社会交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逢盛世的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是自信达观、担当有为的。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奖者中,有的人扎根基层一线,践行扶贫接力的誓言,愿以青春之我传递责任担当;有的人携手长期驻扎偏远乡村,担负着3万余平方公里的供电保障,守护“边疆牧民的生命线”,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有的人在科技研发的尖端坚持团队作战,运用数智技术赋能甲骨文传承保护研究,释放创新创造的青春力量。要大力强调榜样教育,营造正能量榜样的“圈层化传播”生态,组织这些青年模范走进青年群体当中,用自身的成长历程、精神追求、模范行动为广大青年作好表率;同时,做好新兴青年群体引领工作,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深入推进,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两企三新”中的新职业人员规模持续增长,青年群体的构成更为多样,其分布流动也愈发频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2024年5月24日已经发布公示,将增加网络主播、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等新职业和新工种。因新就业群体的有力支撑而不断提升活力的“两企三新”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创新基层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给我们在面对新兴青年群体融入社会的问题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引导好这些青年,尤其是组织好这些青年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开展正面宣传,可为我们抓好网上舆论斗争提供强大的助力。

二是坚持“交往共享”理念,从物质和精神的双向发力夯实青年交往自觉的基础。一方面,对部分青年产生交往悬浮化、功利化之现实症候的诊治,应奠基于对青年现实生活诉求和矛盾心理机制的理解之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0]部分青年在交往中形成“消极个体化”现象的根源在于理想与现实落差中的资源恐慌问题。因此,持续完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有效供给,及时回应青年成长成才的合理诉求,依然是当前化解部分青年萌生“消极个体化社交”危机的前提性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青年工作提到战略层面,为维护青年的普遍性利益诉求提供了实在的资源和渠道。未来,还需继续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审视青年在社会交往中过度追求个人利益背后的思想困境和矛盾心理,发挥组织优势,调动社会资源,帮助青年解决好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在为青年排忧解难的过程中倾注集体主义的价值基因,把青年一代

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另一方面,重点关注当前个人主义思潮在青年中生发样态的合流化与数字化动向,揭示个人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反智主义等相互交织出复杂面相以迷惑并笼络青年群体的传播风险,培育青年形成理性的交往目的,创造合理的交往成果。当前,个人主义思潮勾结新自由主义,将“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奉为圭臬^[31],兜售个人与政府、私有与公有互不相容的立场;也常与具有泛娱乐化倾向的消费主义共谋,制造资本逻辑裹挟下的“虚假需求”和“消费狂欢”,滋生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观危机;个人主义思潮还善于包装“反智主义”以推广反理性极端观念,旨在解构他人以确立自身权威,从而对冲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任由这些交叉叠加的错误思潮在青年交往中蔓延,势必会影响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为此,就要加强对青年理论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水平的培养,指引青年处理好个体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认识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多到社会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防止沉迷网络。促使青年用勤劳诚实的劳动实践积极投身到现实交往当中,在担当奋斗中体察现实矛盾,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矛盾。由此,当前最关键的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引导青年主动自信地融入社会,在自我历练与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彰显劳动意义和人生价值。同时,还要引导青年在个人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合流中把握主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高校思政课作为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教育的课程,尤其要发挥其主渠道作用,发挥讲道理的本质功能,提升青年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引导其保持战略定力^[32]。

三是坚持“交往共治”理念,号召多元主体协同优化青年交往的现实环境。处理好数字时代青年交往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靠某一主体或依赖某一技术环节,必须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工作理念,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职、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33]。以青年在网络社交平台寻找“搭子”为例,在党的领导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下,社交平台的开发者要在法律法规和行业公约的规范下做好算法运作的价值遵守和信息把关;平台内容的生产者要通过新质技术的不断创造为青年网民提供优质的社交资源;广大青年网民也要增强自身的信息筛选和鉴别能力,增强主动监督的主人翁意识。这是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数字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工作应有的具体指向。

(三)国家层面:拓展青年交往格局,熔铸青年“会交往”的历史主动

一是要引领青年胸怀“国之大者”,把握正确交往方向,强化“会交往”的认知清醒。胸怀“国之大者”,就是“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3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青团要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35]。当前,做好青年的交往工作,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党、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其中

思政引领力居于首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一场历史接力赛，离不开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这既是党和人民对青年成长发展的殷切期望，也是青年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应有价值取向^[36]。为此，要教育引导青年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不囿于眼前得失，更看重长远发展。帮助青年在服务他人和造福社会的过程中规避“可怜、有限、自私”的乐趣，寻求更高层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抵御“精致利己主义”的侵蚀，真正用行动践行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的完美境界：“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37]。面对“两个大局”加速演进下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许多共同问题，中国青年不仅要有中国情怀，也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的胸怀，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敢于在大是大非面前亮剑，敢于通过中国青年的话语叙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是要引导青年拓宽国际交往视野，发出“中国故事”的青年最强音，增强“会交往”的行动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始终涌动着青年的使命与担当力量。从普遍性视角看，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开启文明新阶段的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借助了青年这一推进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要素。但若从特殊性视角看，从民族劫难中觉醒出场的中国青年在推动中华民族文明转型和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更加凸显了其建构性作用。在“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命运”光荣传统的引领下，中国青年的主体性内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建国、富国、强国的历史轨道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青春能量^[3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关键在于青年之间的交往”^[39]，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各国青年要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40]。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不仅要能肩负起建设祖国的使命，而且要承担起为世界、为人类作贡献的责任。这就要求中国青年既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时刻关注世界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既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又要重视学习的深度，通过对中外语言文字的求知和实操，发挥自身优势，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和听得进的途径与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用中国青年的时代强音展示好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促进中国梦和各国人民的梦相融通，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为深入实施中国青年全球伙伴行动，黑龙江、天津、广东、湖北、山西、海南等地共青团通过“天津市和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青年代表圆桌会”“黑龙江省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嘉年华系列活动”“‘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计划伙伴活动”等，不断加强与外国青年组织和各国青年的交流交往，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共同发展搭建了实践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之路，为中国青年和海外青年的交往互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使他们不仅共享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机遇，也成为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携手共建未来的重要青春力量^[41]。将来，我们还要继续拓宽中外青年交流的支持渠道，充分发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胜任力，引导青年通过普遍交往中的劳动历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力量^[42]。

[参 考 文 献]

- [1][4] 李素霞:《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 [2] 《习近平寄语新时代青年强调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载《人民日报》,2024年5月4日。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263.htm#4
- [5] 武亚运:《虚拟现实与青年的社会交往:马克思人学向度的探讨》,载《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4期。
- [6] 李 勃:《当代青年网络社交变特点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 [7] 杨 鑫:《青年“搭子社交”现象:缘何流行、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载《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2期。
- [8] 路 鹏 李 浩 王子涵:《作为符码的社交:中国式关系视角下青年群体朋友圈点赞行为研究》,载《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4期。
- [9] 郑莉娟 郑 刚 宋晓波:《网络人际交往影响大学生心理韧性研究——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和网络素养的调节机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 [10][35][39][40]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2、8、63、115页。
- [11] 王昕迪 胡鹏辉:《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 [12] 曲垠姣 杨 峰:《青年融入网络群体的交往效能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13][14][18][20] 刘 哲:《当代青年群体社交新样态》,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13期。
- [15] 董丽雪:《符号“膨胀”: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的缺场交往与情感联结》,载《青年记者》,2023年第22期。
- [16] 张 戎 汤涓甜:《隐匿即显露:青年匿名社交的平台、动因及展演》,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4期。
- [17] 王德福:《轻社交与浅缘社会:新生代青年的社交转型及其社会后果》,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5期。
- [19] 《从饭搭子到蛋搭子,年轻人为啥流行找搭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3510103626033340&wfr=spider&for=pc>
- [21] 《网络交友平台安全吗?什么人容易掉入网络交友陷阱?》,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523030839548397&wfr=spider&for=pc>
- [22] 吴炜生:《个人主义思潮在青年中的发展新动向及其透视与应对》,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 [23][29]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 [24] 杨江华 杨思宇:《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 [25] 《文字表达能力下降 这些年轻人为何“词穷”》, 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40227/t20240227_526609873.shtml
- [26] 《38万网友互助摆脱“文字失语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3181338499337754&wfr=spider&for=pc>
- [27][38] 张雪梅 吴炜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青年力量及其审思与建构》,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 [28] 吴炜生 张雪梅:《新时代青年的担当图景及其精神熔铸》,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 [31] 程恩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9308.html>
- [32] 吴炜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党的百年成就经验的价值意蕴、问题研判和可行路径》,载《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
- [33]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57页。
- [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
- [36] 张雪梅 吴炜生:《“内卷化”冲击下的新时代青年奋斗精神及其培育理路》,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 [41] 《中外青年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2175526629366125&wfr=spider&for=pc>
- [42] 吴炜生 李建鑫:《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青年劳动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蕴》,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年第6期。

(责任编辑:孔 庚)